

四川大学「211工程」子项目
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晚清民国四川学术文化系列

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

周鼎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执两用中

观风察变



四川大学『211工程』子项目
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晚清民国四川学术文化系列

观察变

刘咸忻学术思想研究

周鼎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执两用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周鼎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7. 7
ISBN 978-7-80752-074-0

I. 刘… II. 周… III. 刘咸炘—学术思想—
研究 IV. B2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899 号

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

周 鼎 著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028)87427333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4.125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074-0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总序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之期，亦是中国学术向现代性转型之季。四川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边远地区，无论社会变迁，还是学术文化转型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四川学术转型与尊经书院的创办和发展关系甚为密切。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所设课程为经、史、小学、辞章，其中尤重经学。1879年，四川总督丁宝桢聘请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担任书院山长，主讲春秋“公羊”学。书院曾把学生在经、史、辞章方面的优秀文章刻为《蜀秀集》，后又将《尊经书院一、二、三集》刊刻印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尊经书院开始由主通古学转向传授“新学”，增设天文、舆地、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现代科目；还创办了《蜀学报》，鼓吹西学。后几经变更，书院成为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其中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廖平、宋育仁、谢无量、吴之英、张澜等都曾入长或执教于四川大学及其前身各校。这一转变堪称是四川学术转型的主流。

20世纪20年代以降，祝曾同、何鲁之、叶秉诚、束世澂、丁山、柳诒徵、萧公权、伍非百、吴虞、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胡鉴民、蒙思明、刘咸炘、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吴天墀等名家先后

活跃于四川学坛。这批学者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学术更急剧地向现代性转型之季。他们的经历与学源差别极大，有留学西洋者，有来自中心区域者，也有纯属川中地方学者，在新学旧学变换之中所持观点异趣互见。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又都处在从旧学向新学过渡的过程之中。来自中心区域的徐中舒先生和留学归国的李思纯先生等已大体走上现代科学史学的道路。但更多学者如蒙文通、刘咸忻等却与廖平等相似，皆由经学而新学，既与古学有剪不断的联系，又受时代的影响而不同程度地涉足新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貌，为中国古学向现代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掘这一区域性学术转型的进程、成就和特征，是全面考察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晚清民国四川学术丛书》拟逐个研究此间四川有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渊源、学术成就与学术特点，以图较充分地展示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学术转型的历史形态。

编 者

2006年10月30日

序

作为本书作者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我十分高兴看到这部凝聚着作者四年心血的研究成果现在有机会跟广大读者见面。周鼎博士从硕士研究生开始便一直跟随我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方向的学习和研究。他的学识和才华在同辈之中称得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眼前这本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便足以证明这点。

关于这部洋洋三十多万字的著作，值得一提的地方实在不少。但我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便是重建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湮没不彰的民国时期成都知名学者刘咸炘的学术思路和文化观念，这不仅为至今尚是大片空白的近代四川学术史领域开垦出了一小块弥足珍贵的园地，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提供了一个极富新意的边缘视角。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到学术、从上层到下层的焦点转移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极大地拓宽和深化了我们的历史认知，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中尚存在的种种不足。如在思想史上，除了上层的少数思想精英和下层的“一般思想”之外，处于中层的地方性学者是否也应该加以重视呢？缺少了他们，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便不可能真正重建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

样大胆设想，思想精英的思考与写作中隐藏着的听众其实并不是一般民众，而恰恰是这些中层的地方性学者。透过他们的眼光，我们或许能够重新发现思想精英们的话语背后不太为人所知的面相。

周鼎博士的这本著作正是以刘咸忻的文化思想为个案，对以上思路进行了可贵探索。尽管我对于他的研究能力充满信心，但是对于他的这个论文选题我还是心存顾虑。毕竟此前关于刘咸忻的研究可谓一片空白，而刘氏本人又不幸早逝，留下的著述虽然丰富，可惜都称不上系统完整的专著，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以绣花针的精细功夫将那些散落的珠子重新串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理出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来。除此之外，这个选题的难度还在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咸忻可以被视为国学大师，他涉猎广泛，其著作除了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外，还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新学”（亦称“西学”）多有研究。所以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旧学”和“新知”都必须有相当的根柢。附带要说明一下的是，当时刘咸忻的《推十书》是1996年由成都古籍书店出版的影印本，不仅字迹模糊，阅读费力，而且其中的文章大都是通篇无一点读的文言体，仅仅将这百万字重新标点一遍便是一项不小的工程。

令人欣慰的是，周鼎博士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大致克服了以上提到的种种艰难，最终完成了这项难度极大的研究选题。他在本书中秉承“知人论世”的中国史学传统，以刘咸忻的文集和诗集为基本材料，结合刘氏族谱和口述记录，以近代成都的社会变迁为背景，生动地勾勒了刘氏尚不为后人所知的一生。作者对刘氏思想的分析是从其祖父刘沅的先天之学与其私淑的章学诚的后天之学入手，进而揭示了其“人事学”的学问宗旨。接下来，他又分别从经学、儒学和道学诸角度进一步探究刘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揭示了其与当时主流学者和思想精英之间大相径庭的边缘特色。最后部分，也是本书

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作者致力于批判性地建构刘氏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体系的贯通天人兼容儒道的所谓“道术”的文化观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极富创造性的文化观念背后潜藏的内在张力。

通观全书，资料详赡，论证严谨，眼光敏锐，文笔流畅，的确是一部用力甚深用心甚苦的优秀学术著作。对于有兴趣从事刘咸炘研究或者四川学术与文化研究的学人而言，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参考文献。当然，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该书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如刘咸炘与当时四川思想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关系便语焉不详，使我们失去了进一步了解近代四川文化的一个良机，这是令人颇感遗憾的。另外，虽然刘氏英年早逝，但是其思想观念应当经历了一个演变历程，而作者似乎对此也未加以留意。正如人们常说的瑕不掩瑜，我提出以上批评并无意抹煞该书的价值，而是衷心希望周鼎博士在日后的为学生生涯中能取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成绩。是为序。

陈廷湘

绪 言

1932年，年仅36岁的刘咸忻病逝于成都槐轩老宅中。前来吊唁的门生故旧络绎不绝。在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的挽联中，有两副挽联最能引起后人的注目^①。

其一云：

焉知嗣祖非为福
最惜刘安善著书

其二云：

传世著奇书，早见一篇成大业
享年同后圣，幸留三凤在人间

前一联用典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别具匠心。《世说新语·术解篇》记：“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

^① 《双流刘鉴泉先生挽辞》，石印本，四川省图书馆馆藏。

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①又《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②上联叹惜哲人萎矣，而世乱犹未已，先亡者未必不幸，未亡者未必称幸。下联称赞了亡者的博学多才，又暗暗点明了挽联撰者与亡者的甥舅关系。这副意蕴丰富的挽联的撰者正是素有新文化运动的“老英雄”之称、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吴虞。虽然他年长刘咸炘甚多，论辈分却是刘氏的外甥^③。年长而为晚辈的吴虞思想激进，年少而为长辈的刘咸炘则思想保守，两者相映成趣，倒也颇能象征现代中国新旧之间错综复杂的缠绕纠结。

第二副挽联文理稍浅。后圣者，颜回也。孔子尝叹息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④。依《孔子家语》的说法，颜回也是“三十一早死”^⑤。刘咸炘身后留下三子，故有三凤之说。倒是其中上联的“早见一篇成大业”一语颇为费解，似乎是说撰者若能及早闻睹刘氏之著作，便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若非落款分明写着刘湘二字，或许此联颇有不伦不类之嫌。刘湘是四川现代史上最著名的

①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381页。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简体横排本），第1652页。

③ 吴虞的母亲是刘沅的第三子刘椅文的女儿，亦是刘咸炘的堂姐。其实刘、吴两家的姻亲关系还可以追溯到吴虞的祖母。吴虞的祖母是刘沅的长兄刘濯的女儿。此处承蒙刘咸炘的长子刘伯谷先生告知。

④ 《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第113页。

⑤ 《孔子家语》，第98页。关于颜回去逝时的确切年龄颇有争议，详见《论语正义》，第113页；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60—62页。

军阀之一。他曾力邀刘咸忻入幕襄理政事被其婉言拒绝^①。故而在这副挽联中，刘湘的遗憾之情犹溢于言表。

与其他挽联一样，吴虞和刘湘笔下或许有溢美之辞，然而透过这两副挽联，我们不难对刘咸忻平淡却绝不平凡的一生生出极大的好奇来。刘咸忻出身近代成都颇具声望的书香门第。他自幼慕学，笔耕不辍，虽英年早逝，却已著作等身。其生平著述大都收入《推十丛书》中，约 231 种，475 卷。已刻印者十之八九，其余手稿则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或不幸散失。1996 年，在刘咸忻百岁诞辰之时，成都古籍书店出版了《推十书》影印本，全书共三册，收录刘咸忻的代表性著作 65 种，151 卷。此书虽非完璧，然足以令人一窥全豹了。

刘氏文集取名“推十”，实取义于孔子“推十合一为士”之说。其平生读书治学规模宏大，体系严整。作为一名颇有名气的目录学者，他生前便屡次将自己的著述分类编录：一、总挈学术纲旨，如《两纪》、《中书》；二、涉及哲理思辨、探讨天人关系，比较中西异同，如《内书》、《外书》；三、辨析学术源流、思想变迁，如《左书》；四、探究社会沿革、文化转型，如《右书》；五、指示治学门径，如《浅书》。此外，他还撰有《四史知意》、《史学述林》、《目录学》、《续校雠通义》、《道教征略》、《文心雕龙阐说》、《文学述林》等史学、目录学、道教和文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专著。他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大都分别收入《推十文》与《推十诗》中。值得一提的是，刘咸忻还擅长书法，尤精篆书与隶书，诸如杜甫草堂等成都名胜处至今犹可一睹其墨泽。另著有《弄翰余渾》一书专论书法。

^① 吴天墀：《刘咸忻先生学术述略——为诞辰百年纪念及〈推十书〉影印版而作》，《推十书》序言第 10 页。另承刘伯谷先生见告，刘湘曾加入由刘咸忻祖父刘沅建立的“刘门教”，其时正是刘咸忻的父亲刘柳文掌教，而刘湘则是刘咸忻的兄长刘咸峻的门人，由此可见刘湘与刘咸忻之关系非同寻常。

对于这位兼治四部的学者，我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学术头衔来称呼他，比如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目录学家、书法学家，甚至道教学者等等。在刘咸忻的学术体系中，他的史学与目录学成就无疑最受世人称道。但刘氏生平交游甚寡，学问道德至今罕为人知，偶有二三知者，则无不叹美。浙江学者张尔田见其《史学述林》、《文学述林》而赞之曰：“目光四射，如球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① 另一名四川现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则誉其所撰方志《双流足征录》“事丰旨远，数百年来，一人而已”，又褒扬其史识“已斐斐度骅骝前矣，是固一代之雄乎”^②！现代新儒家之代表人物梁漱溟与刘氏尤为相契，自称“余至成都唯欲至武侯祠及鉴泉先生读书处”。梁氏还特意将刘咸忻的《动与植》一文附录入自己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以广流传。陈寅恪在抗战时期至成都四处访求他的著作，认为他是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③。钱穆在台湾曾对学生说，若见及刘咸忻的著作，“应仔细翻看”^④。当代著名学者庞朴也盛赞“其文知言论世，明统知类，于执两用中、秉要御变之方法论方面，尤有独特贡献，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可多见的学术珍品，值得仔细玩味”^⑤。

二三知者的“叹美”终究不过是空谷足音。量子理论的奠基人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曾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⑥ 盖思想学说之

① 蒙文通：《评〈学史散篇〉》，《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402页。

② 蒙文通：《〈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序》，《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第108页。

③ 均见萧笈父：《〈推十书〉影印本序》，《推十书》序言第7页。

④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70页。

⑤ 庞朴：《一分为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⑥ Max Planck,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Papers*, trans. F. Gaynor (N. Y., 1949), pp. 33-34. 转引自[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命运往往与自身之是非深浅无关，而不免受时代际遇等外缘因素之影响。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学科亦不例外。刘咸炘的学问道德至今罕为人知的原因，若仅从思想的外缘考察，其不幸早逝无疑最令人扼腕叹息。刘咸炘的论著大都是由读书札记整理而成，虽已自成一家之言，然尚乏缜密融贯之专著。他曾说：“我现在的著作还很粗率，将来尚需按学之系统，删繁就简，纳支入干，化数小种为大种。”可惜英年早逝，遂资志以歿。此外，同样重要的原因或如当代史学名家严耕望所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故学术名家“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①。刘氏一生蛰居西蜀，虽亦曾任教于一二高校，却为时甚短，门墙之下，俊彦寥寥，其思想学说在身后湮没无闻似亦不难想见。

从思想的内在理路来看，刘咸炘为后世学者忽视的重要原因则另有隐情。正如台湾史学家王汎森在反思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状况时曾指出的：“过去，我们似乎将太多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即使被注意到的所谓保守派，也常常是与新派人物保持密切对话的人（如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牵就陈独秀与胡适之处甚多），对于旧派人物的丰富性了解相对较少。”^②不仅如此，同样还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时，太过注意浮沉于全国性舞台的人物或事件，或是想尽办法爬梳庶民的心态，但比较忽略了“中层”的思想文化史，如果地方上的人物被史家注意到，通常

① 严耕望：《治史答问》，《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②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湾），第十四卷四期，第185、186页。

也是因为他后来成为举国所瞩目的人物^①。

王氏的批评与反思可谓一语中的。刘咸炘一生治学的根底始终不出国学之藩篱，所持文化立场则是典型的“保守派”，且平生足不出川，更堪称地地道道的“地方上的人物”。这样的“旧派”且“中层”的学者自然难以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青睐了。

然而，诸如刘咸炘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思想体现了整个知识阶层而不是普通民众的“文化底色”。针对社会学研究中的中心—边缘模式，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历史学家已习惯于对中心化的研究，但他们还极少开始考察‘边缘化’的进程”^②。在中心—边缘模式中，中心与边缘互为依恃，彼此之间常常转移流动，边缘中心化或中心边缘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新派学者从边缘走向中心被广泛关注，而旧派学者从中心走向边缘却罕有人问津。边缘的中心化和中心的边缘化固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一枚硬币的两面却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恰恰是在这些旧派的地方性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未能被仿照西方建立的中国近代学术体系所完全整合的传统学术是如何被边缘化的。法国现代思想家福柯曾建议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所谓的话语分析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③ 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转述为：为什么处于思想史中心的是这些思想，而处于边缘的是那些思想？如果说我们对于处于中

①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湾），第十四卷四期，第187页。

② 参见[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③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2页。

心的这些思想已经耳熟能详的话，那么对于处于边缘的那些思想也应当给予同等的重视。因为产生这些思想与那些思想的位置差异的根本原因不是思想自身而是思想之间的差异。

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学的“中心—边缘”研究，还是福柯的话语分析，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上层”为主的传统思想史研究的阿基留斯之踵（Heel of Achilles）。正如现代接受美学理论所注意到的，读者对于作品并非是被动消极地接受，事实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写作^①。当我们着迷于依据思想精英们的描述来了解历史真相之时，也许地方性知识分子可以让我们换个眼光来重新观察似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也唯有如此，思想史才不会只是一部单声道的老式收音机，而是拥有环绕立体声的家庭影院。于是那些被思想精英们有意无意地遮蔽涂抹的历史记忆很可能在地方性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中被意外发现。当然，笔者无意于矫枉过正地贬低在思想史研究中思想精英的重要地位。思想精英与地方性知识分子对于我们重建历史无疑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佛典《华严金狮子章》云：“师（狮）子眼耳支节，一一毛处，各有金师子；一一毛处师子，同时顿入一毛中。……如是重重无尽，犹天帝网珠，名因陀罗网境界门。”^② 不过，对思想史研究而言，历史也可以视作这一张缀满珠宝的因陀罗网。无论思想精英还是地方性知识分子，都不过是其中的一粒粒珠宝，彼此交相辉映，尽管可能明暗不同，但是皆能折射出历史的真貌来。

① 参见〔德〕冈特·格里姆：《接受学研究概论》，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89页。

② （唐）法藏著，方立天校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63页。

目 录

总 序	(1)
序	(1)
绪 言	(1)
第一章 “知人论世”——家世与生平	(1)
第一节 家世	(2)
第二节 生平	(8)
第二章 “学为人也”——学术渊源与宗旨	(30)
第一节 “家学槐轩，私淑实斋”	(31)
第二节 “学文”——学问宗旨	(57)
第三章 “统莫大乎六经”——经学思想	(75)
第一节 “六经本体”	(76)
第二节 “六艺设教”	(91)
第四章 “合外内之道”——儒学思想	(106)
第一节 儒门大义	(107)

第二节	儒学流变	(150)
第五章	“吾以观其复”——道家思想	(164)
第一节	老子之道	(165)
第二节	道学源流	(205)
第六章	“为人之术”——道术思想（上）	(244)
第一节	天道	(245)
第二节	人道	(284)
第七章	“治群之术”——道术思想（下）	(308)
第一节	家庭伦理	(309)
第二节	社会伦理	(343)
第八章	“取釜铁于陶冶”——中西文化观	(359)
第一节	动与植	(359)
第二节	进与退	(380)
结 语	“塾师”与“教授”——边缘视角下的中国文化的 现代性危机	(402)
参考文献		(414)
后 记		(432)